

《白门柳》：龚顾情缘 与明清之际的词风演进

张宏生 冯 乾

清初词人龚鼎孳的词集《白门柳》，以传奇的笔法记录了龚氏与秦淮名妓顾媚的一段情缘，它所表现的明末党社胜流对青楼名姝的感慕、推引之情，是明清之际社会风习的产物；《白门柳》作为联章词写故事的传奇性质，体现了明清之际以词为传奇的词创作观；而其将士女遇合与家国之思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则是《花间集》以来的艳词传统在明清之际的深化和发展，它对清词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白门柳 龚鼎孳 顾媚 传奇 清词

作者张宏生，1957年生，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冯乾，1971年生，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龚鼎孳和钱谦益、吴伟业在清初齐名，号为“江左三大家”，但其文学成就却一直为论者所忽视。有学者拈出龚氏23首“萤”字韵《金缕曲》，指出清初以龚氏等人为首发起的“秋水轩”唱和，用或悲慨苍凉、或郁悃哽咽、或自怨自艾的声音，合奏出易代乱离的一曲悲歌，为鼎革之际人们疏泄胸中块垒提供了一次机会，因而对清代初年的词风演进有着重要作用^①，堪为有见之言。但前人评龚鼎孳词的价值，或谓“芊绵温丽”^②，或谓“词采精善”^③，均与“秋水轩唱和”诸作风格不侔，必然另有所指。

龚鼎孳有《白门柳》、《绮忏》二词集，皆为早年之作。二集虽然都为艳词，但前者情调统一，脉络齐整，后者内容庞杂，唱酬尤多。可见龚氏析之为二，有其特定考虑。其中尤以《白门柳》的感情、体式和结构，在明清之际的词风演进中，有着独特的意义。

一、《白门柳》的感情轨迹

《白门柳》有龚鼎孳自撰《题辞》，云：“‘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靡曼相倾，恣心极态，江南奉为艳宗。吾所云然，不啻斯谓。要之，‘发乎情，止乎礼’

① 参看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122页。

② 彭孙遹：《金粟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25页。

③ 胡薇元：《岁寒居词话》，《词话丛编》，第4038页。

义’，其大略可得而观焉。”^① 龚氏所引艳诗《杨叛儿》，载于《玉台新咏》的“近代西曲歌词”。虽然龚氏自言“不尚斯谓”，或者是感情的抒发方式不同，其作品本身当然也是艳词，而“江南”二字，则隐然点出了作品的背景。综合考察，这应是一卷记载与顾媚情史的专集^②。余怀《板桥杂记》“丽品”条有云：“顾媚，字眉生，又名眉。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鬓发如云，桃花满面，弓弯纤小，腰支轻亚。通文史，善书画。追步马守真，而姿容胜之。时人推为南曲第一。……未几，归合肥龚尚书芝麓。尚书雄豪盖世，视金玉如泥沙粪土。得媚娘佐之，益轻财，好怜才下士，名誉胜于往时。……嗣后还京师，以病死，殁时现老僧相，吊者车数百乘，备极哀荣。改姓徐氏，世又称徐夫人。尚书有《白门柳》传奇行于世。”^③ 顾媚既出自秦淮旧院，龚之初访眉楼，也是为了狎游，是则以《白门柳》名集，正得其体。史学家孟森先生曾撰《横波夫人考》一文，旁征博引，对龚顾情史考证甚密，惜未及《白门柳》，可谓百密一疏^④。而所谓“《白门柳》传奇”，公私藏书均无著录，疑即此集。“传奇”云云，或为当时文风的某种体现，说见后。

《白门柳》展现了龚顾情缘的一道完整的轨迹，试为之勾稽如下。

1. 初上眉楼。崇祯十四年大计，龚鼎孳考绩为全楚第一，冬，铨选入京。次年春，途次金陵，入眉楼访顾媚^⑤。《白门柳》起首四阙，题为《楼晤》，应是纪实，参以同时之诗，无不一一对应。如[东风第一枝]（《楼晤，用史邦卿韵》之一）：“团扇第、书生覩面。……爱紫兰、报放双头，恰好阮郎初见。”[鹊桥仙]（《楼晤之三，用向芗林七夕韵》之三）：“红笺记注，香麝匀染，生受绿蛾初画。”龚《登楼曲》四首之一亦云：“晓窗染研注花名，淡扫胭脂玉案清。画黛练裙都不屑，绣帘开处一书生。”又[杏花天]（《楼晤之四》）云：“搓花瓣、做成清昼。度一刻、翻愁不又。今生誓作当门柳，睡软妆台左右。”《江南忆》四首之四亦云：“手剪香兰簇鬓鸦，亭亭春瘦倚栏斜。寄声窗外玲珑玉，好护庭中并蒂花。”^⑥ 以上是初见情形。但当时龚鼎孳赴京考选，不能久留南都，因而二人乍见旋别，两情缱绻。[惜奴娇]（《离情，用史邦卿韵》）：“阑干外，愁潮恨岭。一步妆台，受不起、加餐信。……说谎高唐，可好托，春衾性。”[蓦山溪]（《送别出关，已复同返，用周美成韵》）：“清波桃叶，幻出刘郎路。两桨载鸳鸯，透金锁、重城几处。”也即《登楼曲》四首之四所云：“未见先愁恨别深，那堪帆影度春阴。湖中细雨楼中笛，吹入孤衾梦里心。”^⑦

2. 别后情愫。龚鼎孳入眉楼与顾媚定情后，旋即北上，两地睽隔，南北相望，相思之情也尽皆表现在《白门柳》中。其《长安寄怀》诗为其初至京师时所作，诗云：“才解春衫浣客尘，柳花如雪扑纶巾。闲情愿趁双飞蝶，一报朱楼梦里人。”^⑧ 这种离思难遣、寤寐思之的情感在词中亦有表露。有时以神话作比，如[浪淘沙]（《长安七夕》）：“鹊楂一夕锦云收。我做牛郎他织女，夜夜桥头。”[风流子]（《春明寄忆》之三）：“销魂别，泪如巫峡雨，心逐广陵舟。乳燕幕

① 《全清词》第2册“顺康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10页。

② 《白门柳》中多次出现“桃叶”、“薛涛才”、“画眉”、“长干”等词，也可证与秦淮妓即顾媚有关。

③ 余怀：《板桥杂记》，《香艳丛书》第7册，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本，第189—191页。

④ 载《心史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

⑤ 关于龚顾会面时间，另有崇祯十三年年初一说。见陆以湜《冷庐杂记》卷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6页。

⑥ 《登楼曲》和《江南忆》二作，见龚鼎孳《龚芝麓先生集》卷三四，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5页。

⑦ 《龚芝麓先生集》卷三四。

⑧ 《龚芝麓先生集》卷三四。

开，锦笺难托，蜜蜂房闭，香粉都收。……七夕看看过了，梦见还羞。”由于相思难遣，反羡牛郎织女每年一会。有时托古事自喻，如〔小重山〕（《邸怀》七首之五）：“送眼落霞边。只愁深阁里，误芳年。载花那得木兰船。桃叶路，风雨接幽燕。”晋人王献之有《桃叶歌》云：“桃叶复桃叶，桃叶连桃根。但渡无所苦，我自来迎接。”^①王献之能以舟楫迎接其妾桃叶，龚氏遂感慨自己无处可觅木兰船，不能将恋人接到身边。有时则直抒胸臆，如〔眼儿媚〕（《邸怀》七首之一）：“柔肠憔悴无人见，见即恐花羞。试抛脑后，陡来衾底，又嵌心头。”〔浪淘沙〕（《邸怀》七首之六）：“翠幃报花来。春恨重栽。西风吹梦上妆台。旧梦不留新梦远，影里徘徊。”不过，有情人终能好梦成真。顾媚于崇祯十五年中秋北上，甫至沧州，因兵燹纵横，道路阻绝，遂流寓淮河沿岸的清江浦，次年春复渡江返泊于京口。入秋，复北上，辗转徙倚，直到崇祯十六年中秋始达都门。龚鼎孳曾赋〔玉女摇仙珮〕一词志喜，中有“怪年年碧海，成双非易。尽畴昔、罗裙画簟，无数销魂，见面都已”数句，感慨浊世滔滔，士女遇合，真自不易。

3. 濡沫深情。龚鼎孳任兵科给事中期间颇以清流自命，屡屡上疏言事，弹劾权臣，虽或不免感情用事，其踔厉风发之气仍可嘉许。顾媚入京后，龚鼎孳作〔念奴娇〕一词，题为《花下小饮，时方上书有所论列，八月二十五日也，用东坡赤壁韵》，内有“翦豹天关，搏鲸地轴，只字飞霜雪。焚膏相助，壮哉儿女人杰”数句，自矜之余，也言及顾媚之力。但不久龚鼎孳便因此次劾论触怒明思宗而遭逮系入狱，时距顾媚入京仅五十余日。明代诏狱极其黑暗恐怖，龚鼎孳能够承受，和顾媚的精神慰藉当不无关系，因而有关作品也较多，如〔菩萨蛮〕（《初冬以言事系狱，对月寄怀》）：“婣娟千种意，莫照伤时字。此夜绣床前，清光圆未圆？”〔临江仙〕（《除夕狱中寄忆》）：“料是红闺初掩，清眸不耐罗巾。长斋甘伴鹧鸪贫。忍将双鬓事，轻报可怜人。”这也就是《内子初度，时余在狱中》诗其六一诗所云：“萧条四壁不堪愁，酒债琴心自唱酬。近识文君操作苦，侍臣无复鹧鸪裘。”^②另有〔玉烛新〕（《上元狱中寄忆》）：“依稀烛下屏前，有翠靥绡衣，月明安否。小眉应斗。恨咫尺、不见背灯人瘦。香柔粉秀。猛伴得、英雄搔首。千古意，谁许冰丝，平原对绣。”龚氏《上元词》二首则与此相通：“紫雾晴开凤阙初，五侯弦管碧油车。芳闺此夕残灯火，犹照孤臣谏猎书。”其二：“珠斗春浓接玉京，千门万户月华生。五陵游冶青丝骑，谁爱荆卿击筑声。”^③均是自感寂寞而许顾媚为闺阁知己。所以，当龚鼎孳于崇祯十七年获释，与顾媚复得相见时，就作有〔万年欢〕（《春初系释，用史邦卿春思韵》）一词，内有“铁石销磨未尽，算只有、风情痴绝。生抛撇，瘴戟蛮装，更央珊枕埋骨。……料地老天荒，比翼难别”的动情之语，那就不仅是名士佳人的一般情怀，而是患难夫妻的生死深恩。此后，世事变幻，白云苍狗。龚鼎孳先降李自成大顺，后降清，不仅本人成为复杂人物，顾媚也不能不被牵涉其中^④。但不管怎么说，其后期词中仍多有顾媚的影子，如〔菩萨蛮〕（《题画兰云扇》）：“春风宛转朱栏曲，吹花直上烟鬟绿。芳韵一枝斜，镜中人是花。纤云摇更曳，衬出芙蓉

① 《玉台新咏》卷一。

② 《龚芝麓先生集》卷三四。

③ 《龚芝麓先生集》卷三四。

④ 龚鼎孳降顺后，盛传其自我辩解云：“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说见冯梦龙《绅志略》（清钞本）、计六奇《明季北略》（大通书局《台湾文献史料丛刊》本）等。但龚氏在明亡后所填的〔绮罗香〕（《同起自井中赋记》）词有云：“弱羽填潮，愁鹃带血，凝望宫槐烟暮。并命鸳鸯，谁倩藕丝留住。攀杜药，正则怀湘；珥瑶碧，宓妃横浦。误承受、司命多情，一双唤转断肠路。”《题画赠道公》文中亦曰：“国破之日携手以从巫咸，誓化并泥，招魂复出。”则或者龚、顾确有身殉明社之举，但为人所救，得不死。

雪。生爱靠香肩，倒言花可怜。”顾媚善画兰，龚鼎孳《定山堂古文小品》卷下《题画与曹秋岳》云：“甲申夏与秋岳留燕邸，郁郁寡欢。偶出此卷命予属闺人作兰。时则流离惨悴，笔砚颓唐，神虽王不善也。”又《题画兰》云：“舟过燕子矶头，江风殊劲，闺人遂拈弄笔墨以敌其势。于钦视此，当念我蓬窗相对，客心悲未央时也。”这样看来，龚顾二人的文艺活动就不仅是一般的流连光景，而是他们相伴度过亡国后艰难岁月的一种独特体验，或有复杂的心理活动在內。

综上所述，《白门柳》五十九首词，确为龚顾情史。今按时间先后略加诠次，其叙事稍晦者则从略：[东风第一枝]（《楼晤，用史邦卿韵》），[蓦山溪]（《送别出关，已复同返，用周美成韵》），[惜奴娇]（《离情，用史邦卿韵》），[十二时]（《浦口寄忆，用柳耆卿秋夜韵》），[西江月]（《广陵寄忆，用史邦卿闺思韵》），[减字木兰花]（《途中寄忆》），[薄倖]（《春明寄忆》），[浪淘沙]（《长安七夕》），[眼儿媚]（《邸怀》），[念奴娇]（《中秋得南鸿喜赋，用东坡中秋韵》），[兰陵王]（《冬仲奉使出都，南辕已至沧州，道梗复返，用周美成赋柳韵》），[祝英台近]（《闻暂寓清江浦，用辛稼轩春晓韵》），[风中柳]（《复闻渡江泊京口，用孙夫人闺情韵》），[贺新郎]（《得京口北发信，用史邦卿韵》），[玉女摇仙珮]（《中秋至都门，距南鸿初来适周岁矣，用柳耆卿佳人韵志喜》），[念奴娇]（《花下小饮，时方上书有所论列，八月二十五日也，用东坡赤壁韵》），[菩萨蛮]（《初冬以言事系狱，对月寄怀》），[临江仙]（《除夕狱中寄忆》），[玉烛新]（《上元狱中寄忆》），[万年欢]（《春初系释，用史邦卿春思韵》），[绮罗香]（《同起自井中赋记，用史邦卿春雨韵》），[石州慢]（《感春》），[小重山]（《重至金陵》），[西江月]（《春日湖上，用秋岳韵》），[桃源忆故人]（《同善持君湖舫送春，用少游春闺韵》）。

二、《白门柳》与明末社会风习

《白门柳》中所表现的明末党社胜流对青楼名姝的感慕、推引之情并非偶然，它是明清之际社会风习的产物。相对于波诡云谲、险恶多端的政治环境，明末社会风气放纵奢靡，江南地区尤为突出。这或如顾炎武所云^①，有江南风流蕴藉的历史积淀在內，但和当时的社会思潮或许关系更深。明朝自嘉靖、隆庆以来，从官方哲学程朱理学分离出来的阳明心学，以其简便易习风靡一时，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上崇尚个性、纵情憎礼的风气。尽管其后东林学派提倡简朴，鼓吹实行，复社也以兴复经术，敦崇道学相标榜，但东林之学亦主斥乡愿，近狂狷，复社兴起之际，王学左派之泰州学派所掀起的个性解放思潮余波尚存，所以身当其流的江南士子，罕有固守法者。

与此相应，明代中叶以后江南声妓繁盛，南都及苏、松、常、杭诸州郡更为突出。据《板桥杂记》载：“金陵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连云，宗室王孙，翩翩裘马。以及乌衣子弟，湖海宾游，靡不挟弹吹箫，经过赵李。每开筵宴，则呼传乐籍，罗绮芬芳，行酒纠觞，留髡送客，酒阑棋罢，堕珥遗簪。真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也。”^②声妓繁盛既是社会风气奢靡的征象，又因其推波助澜而使后者往而不返。极富意味的是，明代选拔官吏的场所南都贡院与声妓之渊藪秦淮旧院仅有一河之隔。于是，“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回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欢，或订

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南北风化之失”条云：“江南之士轻薄奢淫，陈梁诸帝之遗风也。”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76页。

② 余怀：《板桥杂记》，《香艳丛书》第7册，第179页。

百年之约。蒲桃架下，戏掷金钱；芍药栏边，闲抛玉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战之外篇。”^①当时声妓之盛和士人留恋声色、纵情诗酒的状况可以想见。

在这种社会风气中，南中党社胜流与旧院名媛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有的甚至逾越了男女之间的社会界限和性别界限，如柳如是之与汪汝谦，顾媚之与陈梁^②。即以顾媚而言，与她相交往的明末党社中人就有张明弼（字公亮）、吕兆龙（字霖生）、陈梁（字则梁）、刘履丁（字渔仲）、冒襄（字辟疆）、吴绮（字园次）、邓汉仪（字孝威）、张岱（字宗子）、吴伟业（字骏公）、方以智（字密之）、阎尔梅（字古古）、余怀（字淡心）等。尽管这种关系仅限于少数知识精英与名妓之间，但后者放弃了自己的女性身份，以被男性群体接纳为荣，却可以视为晚明女性意识萌蘖之一端，也显示出晚明社会风气的独特开放性。陈寅恪曾分析其中原因云：“寅恪尝谓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王姿明慧，虚心向学所然，然亦因其废闺房之闲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③南中名姝的乐籍身份迥异于闲处闺房的普通女性，使之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封建礼法的羁缚，得以自由地与社会名流相往还。她们兼善才艺，雅有情趣，又识大体，知善恶，故名士也往往将其当做精神寄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相互推引，相互依存的关系带有几分超越时代的人文色彩，他们之间相敬相慕的感情也有类于现代意义上的爱情。除了龚鼎孳和顾媚，钱谦益和柳如是，冒襄和董小宛等，也都是如此。张潮《虞初新志》卷五载徐芳《柳夫人小传》：“（钱柳）相得甚欢，题花咏月，殆无虚日。每宗伯句就，遣鬟矜示柳，击钵之顷，蛮笺已就，风追电蹶，未尝肯地步让。或柳句先就，亦遣鬟报赐。……于时旗鼓各建，闺阁之间，隐若敌国焉。”又卷三载张明弼《冒姬董小宛传》：“（冒、董）日坐画苑书圃中，抚桐瑟，赏茗香，评品人物山水，鉴别金石鼎彝，闲吟得句与采辑诗史，必捧研席为书之。意所欲得与意所未及，必控弦追箭以赴之。……相得之乐，两人恒云天壤间未之有也。”这样，就如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在《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中所指出的：“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以及恩格斯对这一观点的进一步表述：“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④名妓的爱情婚姻状况当然不能完全用来衡量当时妇女解放的程度，但也可以作为重要的参照系。龚鼎孳在《白门柳》中所表现的和顾媚之间的感情，也可视为这一参照系中的一个参数。

三、《白门柳》的传奇特质

余怀《板桥杂记》言及龚顾情史时说：“尚书有《白门柳》传奇行于世。”今查公私书目，龚并无传奇题为《白门柳》者，可知所谓“传奇”，即指词集《白门柳》。但是，余怀为何将这一词集称为“传奇”？

“传奇”一语原是对唐人文言小说的称呼，其后相沿，宋元戏文、诸宫调、元人杂剧以及明

① 余怀：《板桥杂记》，同前书，第182页。

② 见冒襄编《同人集》（康熙水绘园刻本）卷四，陈梁诸书中称顾媚“媚兄”、“眉兄”。

③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5页。

④ 傅立叶语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8页注释；恩格斯语见其《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同上书，第411—412页。另参看陶慕宁《青楼文化与中国文学》第5章《明末清初江南文酒声妓之会与青楼文学的政治色彩》，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代以唱南曲为主的长篇戏曲都可以称为传奇，可见它兼有内容和形式两种功能。从内容上说，它必须奇异，即不同一般；从形式上说，它必须叙事，即要求长篇。南中胜流与旧院名妓之间的交往，以至谈婚论嫁，两情相契，当然都是传奇的好素材，正如谈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都谏娶娼”条所云：“云间许都谏誉卿娶王修微，常熟钱侍郎谦益娶柳如是，并落籍章台，礼同正嫡。先进家范，未之或闻。”^①而这种奇事，往往错综复杂，跌宕起伏，非大篇无以敷演。龚鼎孳将自己与顾媚从相识相知到同甘共苦的过程都表现在《白门柳》中，已如前述，至于体式，由于词的篇幅短小，将若干篇联缀起来，形成联章，加以编排，体现出一定的叙事过程，也就具有了大篇的性质。

文学史一般认为，词是一种抒情艺术，其审美特质在很大程度上是抒写人们心中的隐约幽微之情。但现代词学家吴世昌先生却敏锐地抉出词写故事的功能。早在1936年，他在《新诗与旧诗》一文中就指出：“小令初起时也是有故事骨干的，《花间集》中短调如〔浣溪沙〕，有不少都包含完整的故事结构，北宋短调如清真〔少年游〕、〔长相思〕，小山的〔清平乐〕、〔诉衷情〕，也都有故事结构。”又于同年评周邦彦〔瑞龙吟〕云：“近代短篇小说的作法，大抵先叙目前情事，次追述过去，求与现在上下衔接，然后承接当下情事，继叙尔后发展。欧美大家作品殆无不守此义例。清真当九百年前已能运用自如。第一段叙目前景况，次段追叙过去，三段再回到本题。杂叙情景故事，又能整篇浑成，毫无堆砌痕迹。又，后人填长调，往往但写情景，而无故事结构贯穿其间，不失之堆砌，即流为空洞。《花间》小令多具故事，后世擅长调者，柳、周皆有故事，故语语真切实在。”^②按照吴先生的这一思路，单篇词能够写“故事”，联章词当然更能。而且，联章词中所写的故事互相关联，最适合表现故事的全过程，因而就往往具有“传奇”的特色。

以词为传奇的观念到了明清之际更为突出，同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吴伟业可以作为参照。王士禛《花草蒙拾》评论道：“娄东驱使南北史，澜翻泉涌，妥贴流丽，正是公歌行本色，要是独绝。”^③所谓“歌行”，指吴伟业以七言长篇写时事的“梅村体”。在词的方面，吴伟业曾被清人称为“本朝词家之领袖”^④，或有过誉，但其词确有创造性，诗词相通即其体现之一。如十三首〔满江红〕，以史事、时事入词，正可称为词中的“梅村体”。如〔满江红〕（《蒜山怀古》）：“沽酒南徐，听夜雨、江声千尺。记当年、阿童东下，佛狸深入。白面书生成底用，萧郎裙屐偏轻敌。笑风流北府好谭兵，参军客。人事改，寒云白。旧垒废，神鸦集。尽沙沉浪洗，断戈残戟。落日楼船鸣铁锁，西风吹尽王侯宅。任黄芦苦竹打荒潮，渔樵笛。”此词名为怀古，实咏杨文骢抗清事。据《明史·杨文骢传》：“文骢善书，有文藻，好交游。干士英者多缘以进。其为人豪侠自喜，颇推奖名士，士亦以此附之。明年迁兵备副使，分巡常、镇二府，监大将郑鸿逵、郑彩军。及大清兵临江，文骢驻金山，扼大江而守。五月朔，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其地，兼督沿海诸军。文骢乃还驻京口，合鸿逵等兵南岸，与大清兵隔江相持。大清兵编大筏，置灯火，夜放之中流。南岸军发炮石，以为克敌也，日奏捷。初九日，大清兵乘雾潜济，迫岸，诸军始知，仓皇列阵甘露寺。铁骑冲之，悉溃。”以史衡词，若合符契。从这个意义上说，吴伟业以歌行体入词，也是一种传奇式的写法，唐人传奇的产生正和长庆体的产生大体同时，彼此互有影响。如果说从长庆体发展而来的梅村体影响了词，使得词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传奇的特

① 谈迁：《枣林杂俎》，上海新文化书社1934年版，第251页。

② 吴世昌：《词学论丛》，《罗音室学术论著》第2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800、890—891页。

③ 王士禛：《花草蒙拾》，《词话丛编》，第685页。

④ 张德瀛：《词征》卷六，民国三十年刻闾楼丛书本。

征，应是题中应有之义。值得提出的是，龚鼎孳对梅村体并不陌生，集中不乏仿作。著名的有《金阊行为辟疆赋》，写名士佳人的乱世遭遇，寄寓家国之悲，流离之感，风格神似吴伟业《圆圆曲》诸作，可见当时文人之间创作的关系。吴伟业能够以歌行之法入词，是对文学史的一种创造，流风所及，对同时诸人不可能全无影响。龚鼎孳接过来加以发展，可谓后出转精。因此，余怀将《白门柳》称为传奇，也不是没有缘故的。

当然，《白门柳》之被称为传奇，和它的内容仍有更加密切的关系。明清之际，士女遇合与家国之思非常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一时胜流从不同方面表现这一内容，争奇斗艳，各有千秋。诗歌已如上述，散文如冒襄《影梅庵忆语》、侯方域《李姬传》等，分别记述作者和董小宛、李香君的情事，也都可称之为传奇，在这种背景中，龚鼎孳将自己的词作编纂成集，也含有珍视这一段感情的意思。事实上，龚鼎孳对传奇体情有独钟，他曾仿传奇体作《圣后艰贞记》，记述明熹宗张皇后的遭际，其书虽然今已不存，但可由此见出他的创作意向，而《白门柳》正可视作这一思路的合乎逻辑的产物。词中所记录的情感如初遇之热恋，相思之苦痛，亡国失路之憔悴，相濡以沫之深情，跌宕起伏，哀感顽艳，正是易代乱离中士女遇合的一出传奇。明代传奇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对情的重视，如《牡丹亭题词》所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①《白门柳》的传奇性在这一点上也能体现得非常明确。

这里，我们想把龚鼎孳的《白门柳》和冒襄的《影梅庵忆语》略作比较。《影梅庵忆语》写与秦淮名妓董小宛的爱情，情真意挚，深沉婉转，是晚明散文小品的代表作之一。从二人交往的过程看，由相识进而相知相伴，也经历了一段坎坷。如冒襄牵于家事科场，与董小宛几经离合：“姬曰：‘我装已戒，随路祖送。’余却不得却，阻不忍阻，由浒关至梁溪、毗陵、阳羨、澄江，抵北固，越二十七日，凡二十七辞。姬惟坚以身从。登金山，誓江流曰：‘妾此身如江水东下，断不复返吴门！’余变色拒绝，告以期逼科试，年来以大人滞危疆，家事委弃，老母定省俱违，今始归经理一切。且姬吴门责逋甚众，金陵落籍，亦费商量。仍归吴门，俟季夏应试，相约同赴金陵。秋试毕，第与否，始暇及此。此时缠绵，两妨无碍。姬仍踌躇不肯行。时五木在几，一友戏云：‘卿果终如愿，当一掷得巧。’姬肃拜于船窗，祝毕，一掷得‘全六’，时同舟称异。余谓果属天成，仓促不减，反债乃事。不如暂去，徐图之。不得已，始掩面痛哭失声而别。余虽怜姬，然得轻身归，如释重负。……金桂月三五之辰，余方出闹，姬猝到桃叶寓馆。盖望余耗不至，孤身挈一姬，买舟自吴门，江行遇盗，舟匿芦苇中，舵损不可行，炊烟遂断三日。初八抵三山门，恐扰余首场文思，复迟二日始入。姬见余虽甚喜，细述别后百日，茹素杜门，与江行风波盗贼惊魂状，则声色俱凄，求归逾固。……七日乃榜发，余中副车，穷日夜力归里门，而姬痛哭相随，不肯返。且悉姬吴门诸事，非一手足力所能了。责逋者见其远来，益多奢望，众口谗谮。且严亲甫归，余复下第意阻，万难即诣。舟抵郭外朴巢，遂冷面铁心，与姬决别。仍令姬归吴门，以厌责逋者之意，而后事可为也。”^②这段记载让我们认识到，冒、董终能好合，其间有着不少的曲折。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段话从字面上看，冒、董之关系是董主动，冒被动；董热烈，冒矜持。但我们认为，这毋宁说是作者的一种叙事策略。尽管冒襄作为“复社四公子”之一，言行有放荡不羁之处，礼法的观念仍然为其内心所谨守。所以，他的记载明

① 汤显祖：《牡丹亭》，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 页。

② 冒襄：《影梅庵忆语》，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影印宣统元年至三年上海国学扶轮社《香艳丛书》本，第 581—583 页。

白不过地是想让读者认识他本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动机。值得提出的是，龚鼎孳在《白门柳》的题词中也以“发乎情，止乎礼义”相标榜，考其动机，或者因乐府《白门柳》太过香艳，因而提醒读者注意二者的差别。就这一点而言，龚、冒二人或有不同，但相同的创作取向却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一致性。所以，如果说冒的《影梅庵忆语》是明清之际士女遇合的一出传奇的话，龚的《白门柳》当然也是。

四、《白门柳》与明清之际词体的演进

以陈子龙等人代表的云间词派，在清初高举变革的旗帜，倡言“五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①，推崇晚唐五代、尤其是《花间》词风，以幽远深微之美，初步扫除了明代以来的浅俗之习，为清词的发展创设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云间词人矫枉过甚，独重小令，也有局限。因为小令方幅狭小，难以反映复杂多端的社会生活，而且风格也比较单一，无法体现作家多方面的创造性。明清之际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一弊端，也尝试予以反拨，龚鼎孳就是其中较早的一个。正如王士禛所评：“云间数公论诗拘格律，崇神韵。然拘于方幅，泥于时代，不免为识者所少。其于词，亦不欲涉南宋一笔。佳处在此，短处亦坐此。合肥乃备极才情，变化不测。”^②

龚鼎孳作词开始也从云间入，善写小令。如〔鹊桥仙〕（《楼晤之三，用向蓼林七夕韵》）：“红笺记注，香糜匀染，生受绿蛾初画。挑琴擘阮太多能，自写影、养花风下。风低金管，带飘珠席，两好心情难罢。芳时不惯是乌啼，愿一世、小年为夜。”〔小重山〕（《重至金陵》）：“长板桥头碧浪柔。几年江表梦、恰同游。双兰又放小帘钩。流莺熟，嗔唤一低头。花落后庭秋。蒋陵烟树下、有人愁。玉箫凭倚胜风流。乌衣燕，飞入旧红楼。”王士禛评前首云：“词至此，是追魂夺魄手段。公擅诗柄，又欲抽秦、柳五花簪耶？”评后首云：“令与陈、宋旗亭画壁，未知谁当擅场。”^③但龚不久就显示出更为开阔的气局：“古人蕴藉生动，一唱三叹，以不尽为嘉。清真以短调行长调，滔滔莽莽，如唐初四杰作七古，嫌其不能尽变。至姜、史、蒋、吴炼字句，法无不备。兼擅其胜者，唯芝麓尚书矣。”^④他最为人称道的是长调，如彭孙遹《金粟词话》所云：“长调之难于小调者，难于语气贯串，不冗不复，徘徊宛转，自然成文。今人作词，中、小调独多，长调寥寥不概见，当由兴寄所成，非专诣耳。唯龚中丞芊绵温丽，无美不臻，直夺宋人之席。”^⑤但今人论及龚鼎孳的长调，每举其后期之作，如“秋水轩唱和”的23首〔金缕曲〕，以为具有扭转风气之功，其实他对调式的探索在早期词中即见端倪。在《白门柳》的59首词中，共有20首长调，显示了龚鼎孳对这一体裁的重视以及驾驭这一体裁的才情。与云间词派远绍《花间》，“不欲涉南宋一笔”不同，龚鼎孳则有意识地取法宋人。据我们统计，《白门柳》有24首为和宋韵之作，虽多取径《草堂诗余》，如明人一般之所为，但由于时代风会和个人际遇，却避免了明人常有的陋俗，呈现出多样的风格。如〔鹊桥仙〕（《楼晤之三，用向蓼林七夕韵》）之缱绻深至，逼似小晏；〔西江月〕（《渡江作》）之清丽峻洁，大类稼轩；〔绮罗香〕（《同起自井中赋记，用史邦卿春雨韵》）之凄婉蕴藉，韵如淮海；〔念奴娇〕（《花下小饮，时方上书有所论

① 沈亿年述《支机集》凡例，施蛰存编《词学》第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5页。

② 王士禛：《花草蒙拾》，《词话丛编》，第685页。

③ 邹祗谟、王士禛：《倚声初集》卷一。转引自张宏生《倚声初集集评》，《清代词学的建构》，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

④ 沈雄《古今词话》引徐钊语，《词话丛编》，第1036页。

⑤ 彭孙遹：《金粟词话》，《词话丛编》，第725页。

列，八月二十五日也，用东坡赤壁韵》之豪放沉雄，格同东坡。值得进一步提出的是，《白门柳》中有 6 首和韵词，专门追和史达祖，设色浓丽，意象绵密，神似史氏。如〔贺新郎〕《得京口北发信，用史邦卿韵》：“莺馆安排静。待珠轮、逐程屯剡，柳旗花令。预遣探香乌鹊去，露洒星桥玉冷。可曾见、卢家官艇。金字虎头青鸟印，押红泥、遮抹春愁影。骑凤月，破烟暝。

瑶箱泪叠朱丝胜，试芙蓉、两行宫烛，对摊芳信。薇雨细揉弹事笔，温熟低心软性。料锦鲤、今番情定。雾幔晴衫深打叠，怕秋棠、不耐商飙劲。因早雁，嘱君听。”这是闻知顾媚北上喜极而作，通过安排住所，遣人相迎，摊信沉思，叠理秋裳等琐细举动，表达出浓烈的感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词中罗列了许多装饰性的名词，如莺馆、珠轮、柳旗、花令、星桥、金字、虎头、青鸟、红泥、瑶箱、朱丝、芙蓉、宫烛、芳信、薇雨、锦鲤、雾幔、晴衫、秋棠、商飙、早雁等，显得绵密繁缛，但由于全篇采用了叙事性的连续结构，意脉贯通，而非简单堆砌，所以并未造成词旨的阻滞不通。这正是学习史达祖词风而得其精华。众所周知，龚鼎孳喜欢提携后进，清初词坛上的风云人物陈维崧、朱彝尊等都得到过他的揄扬。揄扬朱彝尊事见于戴延年《秋灯丛话》，云：“国初宏奖风流，不特名公巨卿为然，即闺中好尚亦尔。龚尚书芝麓、顾夫人眉生，见朱竹垞词‘风急也，潇潇雨；风定也，潇潇雨’，倾囊以千金赠之。”所引词句见于朱彝尊〔酷相思〕（《阻风湖口》）词，朱彝尊《龚尚书挽词八首》其六“江南断肠句，回首向谁夸”句自注曰：“公最赏予《阻风湖口》词”，可见戴延年所言非虚。朱彝尊推崇姜夔、张炎，提倡醇雅清空，开创浙西词派，而姜夔、张炎和史达祖正好词风类似，路数相同。所以，如果说龚鼎孳对朱彝尊开启浙西一派有所影响，应该不是无的放矢之言。文学史上谈到浙西词派，一般都仅仅考虑了曹溶对朱彝尊的影响，现在看来，似乎可以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

其实，仅仅从词的形式上也能看出龚鼎孳对朱彝尊的影响。龚鼎孳的这一卷《白门柳》，记述作者与顾媚相识相知相伴的一段情史，可视为独特的联章之体。无独有偶，朱彝尊《静志居琴趣》一集也是如此。朱彝尊和妻妹暗生情愫，却又无法公开，只能把种种隐微的感情表现在词中。从结构上来说，也是描写了双方交往的全过程，构成了联章的叙事方式。当然，比较而言，在感情的指向上，龚更明确，朱则较隐晦；在感情的体验上，龚略轻倩，朱则更为凝重。这或者是由于顾媚是青楼女子，而寿常是良家闺秀，因而笔致有所不同，取向出现二致，但二人都运用了这一同样的表现方式，却值得注意。我们曾经借陈廷焯的话评价《静志居琴趣》的有关作品是“情词俱臻绝顶，摆脱绮罗香泽之态，独饶仙艳，自非仙才不能。凄艳独绝，是从《风》、《骚》、乐府来，非晏、欧、周、柳一派也”，认为他的词开辟了艳词发展的新局面^①。现在需要加以补充的是，正是龚鼎孳的《白门柳》为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五、青楼文学传统与明清之际的词学复兴

词兴起于唐五代，大盛于两宋，衰微于元明，而又复振起于清。明词衰微的原因，清人曾做过总结。如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九云：“盖明自刘诚意、高季迪数君而后，师传既失，鄙风斯煽。误以编曲为填词，故焦弱侯《经籍志》备采百家，下及二氏，而倚声一道缺焉，盖

① 陈廷焯语见其《词则》之《闲情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影稿本；参看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第 3 章《艳词的发展和新变》。

以鄙事视词久矣。”^①又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云：“词至于明，而词亡矣。伯温、季迪，已失古意。降至升庵辈，句琢字炼，枝枝叶叶为之，益难语于大雅。自马浩澜、施闰仙辈出，淫词秽语，无足置喙。明末陈人中能以浓艳之笔，传凄婉之神，在明代便算高手。然视国初诸老，已难同日而语，更何论唐、宋哉！”^②或谓混词于曲，或谓格调浅俗，都有一定的道理。于是有进一步论述清词的复兴者，如文廷式《云起轩词钞自序》：“有清以来，此道复振。国初诸家，颇能宏雅。迩来作者虽众，然论韵遵律，辄胜前人。而照天腾渊之才，溯古涵今之思，磅礴八极之志，甄综百代之怀，非窘若囚拘者所可语也。”^③又沈增植《彊村校词图序》：“及我朝而其道大昌。秀水朱氏，钱塘厉氏，先后以博奥淡雅之才，舒窈之思，倚于声以恢其坛宇。浙派流风，泱泱大矣。其后乃有毗陵派起……。”^④但尽管人们对清词发展的脉络能够勾勒得非常清晰，可是涉及清词复兴的最初机缘，却往往语焉不详。1991年，孙康宜教授出版了有关陈子龙和柳如是诗词情缘的英文论著，指出在晚明南中胜流与旧院歌妓交往的背景中，陈、柳的唱酬影响了清词的发展方向，是明清之际词坛变革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非常富有启发性^⑤。

词本是在“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素手，按拍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⑥的环境背景中发展成熟起来的，先天地和歌妓有着密切的关系。晚唐五代的不少文学家倾全力于小词创作，先后开创了西蜀和南唐两个繁荣的局面，其中尤以西蜀花间词人更有代表性。我们曾从爱情意识的苏醒和高扬、对女性的尊重、真挚的感情等三个方面说明了《花间集》的价值^⑦，现在看来，这其实也就是《花间集》能够成为后世典范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明清之际的词学建设和这一传统又并不完全一样。在花间词中，全部是男性作家的代言之体，女性的声音只是曲折地传递出来；而在明清之际，名士与歌妓之间已经成为互动的关系。晚唐五代的歌妓只是以体态情愫参与词学建构，而明清之际则在此之外，直接贡献了带有美学追求的作品。陈子龙和柳如是有不少同调同题之作，如〔浣溪沙〕（《五更》），陈：“半枕轻寒泪暗流，愁时如梦梦时愁。角声初到小红楼。风动残灯摇绣幕，花笼微月淡帘钩。陡然旧恨上心头。”柳：“金猊春守帘儿暗，一点旧魂飞不起（返？）。几分影梦难飘断。醒时恼见小红楼，朦胧更怕青青岸。微风涨满花阶院。”又〔踏莎行〕（《寄书》），陈：“无限心苗，莺笺半截。写成亲衬胸前折。临行简点泪痕多，重题小字三声咽。两地魂销，一分难说。也须暗里思清切。归来认取断肠人，开缄应见红文灭。”柳：“花痕月片，愁头恨尾。临书已是无多泪。写成忽被巧风吹，巧风吹碎人儿意。半帘灯焰，还如梦水（里？）。消魂照个人来矣。开时须索十分思，缘他小梦难寻脉（味？）。”^⑧如果说，诸作都能以其情真意切在词坛上占有一席之地，那么，这一成就应是两个人共同的成果。值得提出的是，陈子龙论词有着明确的追溯晚唐五代意识，在《幽兰草序》中，他说：“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

①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词话丛编》，第3433页。

②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词话丛编》，第3823页。

③ 文廷式：《云起轩词钞》，光绪三十三年南陵徐氏刻怀鹾杂俎本。

④ 龙榆生辑录《彊村校词图题咏》，朱孝臧：《彊村丛书附遗书》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8728页。

⑤ 孙康宜教授的英文著作题为：《The Late-Ming Poet Ch'ên Yu-Lung: Crises of Love and Loyalty》，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李学申译题为《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

⑥ 欧阳炯：《花间集序》。

⑦ 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第3章《艳词的发展和新变》。

⑧ 转引自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2—243页。

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斯为最盛也。”^① 不废北宋，是其晚年进境，而紧紧扣住晚唐五代，则说明他复兴词学的明显动机和做法。

在词史的发展中，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人前后开疆拓宇，引进豪放疏朗的格调，但婉约之风一直是主流。而且，“诗之境阔，词之言长”，在某种意义上，词更善于表现人们心中的隐约幽微的感情。这是词的最初传统，也是词的基本特质。因此，在明清之际，面对波诡云谲的风云变幻，不少人仍对艳词情有独钟。如顺治末年，邹祗谟和王士禛在扬州同操选政，以艳词为主，汇集明末清初作品若干篇，成《倚声初集》二十卷，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三个部分。其中小令十卷，录词一千一百十六首；中调四卷，录词三百六十四首；长调六卷，录词四百三十四首。合计选词四百六十余家，一千九百十四首。如此繁富的卷帙，据选者云，是要恢复《花间》传统，但易代之际，人们的心理显然不会那么简单。元好问当金亡后，编《中州集》，以保存故国文献，应该是类似活动的一个注脚。另外，对于邹祗谟和王士禛这样的独具手眼的作家和批评家来说，他们将这些作品汇集在一起，也未始没有文学批评的考虑。文风的变化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在人们心目中，传统题材原已构成某种定势，即使非常细微的变革所引起的结果也往往不可预期。如果说当年秦观“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②，使得艳词呈现出另一种风貌的话，那么，到了明清之际，这一现象无论从量上，还是从质上，都已与前代不可同日而语。这是艳词发展的新气象，也是词史发展的新动向。明清之际的词坛在青楼文化的背景中，重又注入了新鲜的生命力。它是《花间》传统的复归，更是《花间》传统的深化。从这个意义上认识陈子龙和柳如是、龚鼎孳和顾媚的诗词情缘，对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当能看得更为清楚。

〔本文责任编辑：马自力〕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本刊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负责翻译。本刊内容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每期各有中心，文章由世界各国学者撰写，反映各个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动向。本刊全年出版 4 期，逢季中月 25 日出刊，每期定价 17 元。订户如向本社订阅，全年每份收费 72 元（含平寄邮资 4 元），一次付齐。

季刊 16 开 邮发代号：2—461

订阅者请向当地邮局或本社发行部订阅

本社地址：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100720

① 陈子龙：《安雅堂稿》，台北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1977 年影印明末刻本，第 279—280 页。

② 周济：《宋四家词选》，尹志腾编《清人选评词集三种》，齐鲁书社 1988 年版，第 236 页。值得提出的是，陈子龙于北宋词家，独嗜秦观，或许不是巧合。在这方面，孙康宜教授已有论述，见所著《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

of idealist spirit and the liveliness of “the small things” runs throughout these stories providing a unity of opposites, which represents Lu Xun’s unique discoveries in the express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and modern societies. The artistic importance of this work which transcends temporal and space limitations is derived from the pervasion of “essay” consciousness and fictional conceptions and style. China’s new historical novels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have inseparable relations with *Old Tales Retold*. This includes literary creations ranging from those written during the 1930s and 1940s to novels of the “new historicism”. They also provide modern readers wi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artistic experiences that are well worth their attention.

(12) **Baimen Liu: Romance between Gong Dingzi and Gu Mei and the Evolution of *Ci* Poetr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ang Hongsheng Feng Qian °176°

Baimen liu (Willow at Baimen), a collection of *ci* poetry by the *ci* poet Gong Dingzi, who lived during the early Qing dynasty, describes in a unique literary style the romance between Gong and Gu Mei, a well-known courtesan at Qinhuai. The admiration and attachment of public figures during the late Ming to famous women in pleasure quarters was a product of social custom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from the Ming to the Qing dynasty. Telling a romantic story with a series of *ci* poetry in *Baimen liu* exhibited the prevailing literary style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Also the recounting of love affairs and how they progressed in parallel with the destiny of the nation was a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 of erotic poetry since the appearance of *Huajian ji* (A Collection of Flowery Poems). It greatly promoted the rejuvenation of *ci* poetr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13) **Relations between the Nationalist Party (Guomindang) and the Government: Party Rule at Local Levels (1927—1937)** Wang Qisheng °187°

The operation of the Guomindang at local levels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at the central level. Local party headquarters at various levels had a system of their own that was often separate from that of local governments. This represented a major transition of political control from a single-track to a double-track system. In form and theory,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were equal in respects and were supposed to balance, check and supervise each other. This seemed to be an ideal local political system. However, in reality, they were in constant conflicts as each struggle for more power. During the power struggle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Guomindang advocated that local political powers should mainly be in the hand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The result of this was that the party’s share of power in the operation of local politics went on the decline and the party’s control became less factual and more virtual. The separation of the party from the government weakened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its control. The rule of the state by the Guomindang was thus very fragile.